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23-3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01

Hans汉斯

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批判及其扬弃路径研究

杨　依，曾　丽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2日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全域渗透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步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情感作为人类极具主体性与属人性的生命体验，逐步被资本逻辑捕获，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操控的增殖要素，由此催生全面深刻的情感异化危机。西方学界围绕该议题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观念文化批判、存在论批判三大理论范式，不同理论家立足各自学术传统，从差异化视角揭示情感商品化、算法规训化与软性观念渗透的异化表征，理论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对话与内在张力。本文在辨析各理论范式的解释效力与适用边界基础上，厘清数字社会情感秩序的学理内涵，尝试搭建可观测的操作化方向，剖析情感异化的生成逻辑，立足我国现实社会语境，审慎处理国家、市场、社会三方关系，在发挥规制引导效能的同时规避权力过度扩张风险，守护个体情感表达的自由与本真，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级改为：从技术、文化、素养等多维度探寻情感异化的扬弃路径，促使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人的发展的本然定位，构建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数字社会情感秩序。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批判范式，数字情感文明，异化扬弃

Research on the Critique and Sublimation Path of Emotional Alienation in Digital Capitalism

Yi Yang, Li Zeng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October 21,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2, 2026

Abstract

The all-encompassing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pelle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文章引用: 杨依, 曾丽. 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批判及其扬弃路径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23-30.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01

production into the st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Emotions, as life experiences that are highly subjective and essential to humanity, have gradually been captur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transformed into quantifiable, tradable, and manipulable elements of valorization, thereby giving rise to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crisis of emotional alienation. Western academia has formed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paradigms around this issu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the ontological critique.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traditions, different theorists reveal from differentiated perspectives the alienated manifestations of emotional commodification, algorithmic discipline, and soft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ialogues, and internal tensions existing within these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the explanatory efficacy and applicable boundaries of each theoretical paradigm,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emotional order in digital society, attempts to construct observable operational directions, and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emotional alienation. Grounded in the realistic social context of our country, it prudently handles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society, seeking to avoid the risk of excessive power expansion while leveraging regulatory and guiding efficacy, and to safeguard the freedom and authenticity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culture and literacy, it explores pathways to the transcendence of emotional alienation, aiming to guide digital technology back to its inherent positioning of serving human development and to construct a digital social emotional order that integrates both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warmth.

Key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Emotional Alienation, Critical Paradigms, Digital Emotional Civilization, Transcendence of Alie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成为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要对象[1]。数字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存方式，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提升生产效率、拓展交往空间、丰富生活内容的同时，也与资本逻辑深度嵌合，推动“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的发展阶段”[2]。美国学者希勒(D.Schiller)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是指“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3]。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 1983 年《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中，通过对服务业的考察提出情感劳动概念，开启了对情感商品化的批判性研究[4]；伊卢兹(E.Illouz)系统阐释了情感资本主义的理论内涵，揭示了经济理性与市场逻辑对私人情感生活的渗透与重构[5]。韩炳哲从精神政治学角度剖析算法规训下的自我剥削与情感倦怠，揭示了数字权力的微观运作机制，“当下商业政权将情感作为资源，以创造更强的生产力与更高的效率。”[6]情感不仅在经济领域受到资本的剥削，而且在政治层面上也受到了权力的操纵。韩炳哲更多关注主体精神层面的倦怠，较少直接剖析资本的生产与剥削机制，与政治经济学路径形成理论张力。哈特(M.Hardt)与奈格里(A.Negri)从“非物质劳动”视角探讨情感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7]，将情感生产视作当代社会生产的核心部分，强调情感劳动的公共性与反抗潜能。上述理论家并不构成统一的理论阵营。有的侧重生产关系与剩余价值，有的聚焦日常生活的文化变迁，有的偏向个体生存体验的精神分析，彼此之间既有相互借鉴，也存在观点分歧。

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认识，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数字社会情感秩序，是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数字技术与算法深度介入社会情感生产、交往、消费的时代条件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规制资本对情感的过度商品化攫取，协调技术逻辑、资本逻辑与人的情感发展逻辑，平衡国家规制引导、市场创新活力、社会自治力量三者关系，形成制度合理、技术向善、文化健康、个体自主的数字情感状态；它追求情感回归人的属人本质，实现线上–线下情感实践的融通，抵御情感商品化、算法规训、情感虚无等异化现象，同时防范公共干预演变为对私人情感世界的过度管控，守护个体情感表达的真实性与自由度，最终达成个体情感丰盈、社会情感共同体和谐的理想图景。本文提出数字社会情感秩序可观测的操作化指标方向，分为制度、技术、文化、主体、协同关系五个维度(见表 1 数字社会情感秩序操作化指标)。数字社会情感秩序并非完全否定数字空间的情感消费与情感劳动，也不是用公共力量全盘接管个体情感生活，而是旨在划定资本逻辑、公共干预二者的双重边界，让情感的商业利用、公共治理建立在尊重人的主体性、保障个体权益的前提之下。

Table 1. Operationalized indicators of the emotional order in digital society
表 1. 数字社会情感秩序操作化指标

维度	操作化指标
制度维度指标	情感相关数据权益保障制度供给；平台情感劳动权益保护规则；算法伦理审查中情感健康权重设置；情绪煽动内容监管效能；监管权力的程序约束与救济机制完备度。
技术维度指标	推荐算法中“用户长期情感健康”权重占比；平台产品防沉迷、防情绪透支功能覆盖率；支持线下现实交往的数字工具普及度；情感数据的脱敏、授权使用落实情况。
文化维度指标	网络空间消费主义情感叙事的传播占比；传统情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传播成效；网络公共空间理性共情、善意表达的舆论氛围。
主体维度指标	公民算法素养与情感素养水平；公众对算法情绪操控的识别能力；个体线上线下情感生活协调程度；网络情感表达的自主程度与多元表达包容度。
协同关系指标	社会力量参与算法治理、网络情感文化建设的渠道通畅度；平台合法经营与创新空间保障情况；监管反馈、社会监督的闭环机制运行效果。

2. 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批判的三大理论范式

基于现有研究文本，本文将西方学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批判归纳为三大分析范式，分别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存在状态三个层面切入。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情感商品化与剩余价值剥削

20 世纪 80 年代，霍克希尔德通过对空乘人员、收账员等服务业劳动者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已经将劳动者的情感表达纳入生产管理体系，情感不再是私人的、自发的内心体验，而是转变为可交易、可管理的服务商品。霍克希尔德的研究锚定雇佣劳动场景，分析企业对雇员情感的管理与征用，揭示劳动过程中的情感异化。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情感劳动的覆盖范围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也随之向数字领域拓展与深化。2000 年，意大利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一文中首次明确将“情感劳动”与数字时代对接，提出“数字情感劳动”概念，称其也是一种“免费劳动”[8]。情感不仅是劳动的具体内容，也是驱动劳动持续进行的内在动力，资本通过构建情感化的互动场景与反馈机制，诱使用户不断投入情感劳动，实现剩余价值的持续生产与循环。此外，情感劳动的数字化还使得资本能够突破传统的工作时间与空间限制，将个体的休闲时间也转化为劳动时间，实现对生命时

间的全域吸纳，实现对用户全部生命时间的价值榨取。

(二) 观念文化批判范式：情感软治理与叙事引导

数字平台可以依托情感化叙事与传播行为对特定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进行隐秘输出故而平台可以完成温和的观念塑造工作。部分短视频传递的内容可以帮助网民认知他国相关信息但其可以在用户潜意识层面淡化不同社会环境以及成长背景具备的差异化特征[9]。数字算法能够精准识别用户的情感偏好与心理需求，推送符合用户情感倾向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将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认知传递给用户。比如，资本通过构建“幸福文化”“成功叙事”与“快乐哲学”，将个人奋斗、物质消费、快乐至上等价值观念，与个体的情感体验、心理满足绑定在一起，让人们在情感共鸣中自然而然接受这套认知，将对应的社会秩序视为自然、合理、不可替代的存在。

(三) 存在论批判范式：生命情感的焦土化与虚无化

乔纳森·克拉里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出现的反社会、疏离情感等现象称为焦土化[10]。数字资本持续开展操控以及抽取活动使得人类自带的生命情感遭遇持续消耗与榨取并且该类情感无法获取对应的滋养以及修复故而生命情感会转变为一片荒芜的焦土，这片焦土是丧失本真层面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的状态同时主体很难依靠自身力量重新生成生机与活力。海德格尔提出现代技术具备的“集置”(Gestell)效应可以把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简化成计算、订造以及利用层面的关系，人的存在被技术促逼，本真的存在状态还有面向世界的源始体验会被剥夺。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内表达观点，资本主义开展的统治活动已经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日常生活全部范围，资本主义通过对日常感知、休闲、情感开展全面殖民，人的主体性以及生命自带的丰富性会被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里技术对日常生活完成的殖民是达到过往不曾具备的高度，数字技术不是单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这类技术深度嵌入人的生存结构当中，人的感知方式、情感方式以及存在方式被系统性重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在数字空间中，情感失去了现实的根基与土壤，长此以往，人类的情感感知能力逐渐退化，生命情感的丰盈性被不断消耗，最终陷入深刻的虚无与倦怠之中。

3. 西方批判范式的理论价值与内在局限

西方的批判范式对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无法真正为情感异化的扬弃提供可行的现实路径。

(一) 西方批判范式的理论贡献

西方学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批判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西方的批判范式深化了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反思了数字技术发展的人文代价。西方批判范式没有一味的否定数字技术，中国的学者也通过调查，论证了“数字能力比数字资源更能促进学生创造性的提升，对学生创造性的贡献率可达 28%”[12]，中西方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资本对技术的滥用，而不是技术本身，他们都没有陷入技术悲观主义的误区，而是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精神、情感世界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批判范式拓展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当代内涵。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主要聚焦于物质生产领域，关注劳动异化、商品拜物教等核心议题。有学者提到“异化的情感及其活动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的利器”[13]，资本主义的剥削已经从身体、劳动层面深入到情感、生命、潜意识层面。这极大地拓展了资本主义批判的范围与深度，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内容与形态。异化不再仅仅体现为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异化，更体现为情感体验、情感能力、生命状态的全面异化，这是数字时代异化的

新形态、新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二) 西方批判范式的内在局限

尽管西方批判范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由于其理论立场、方法论与社会语境的多重限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一是未能提出根本性的扬弃方案。西方的批判理论大多停留在揭露问题、批判现象、揭示危害的层面，虽然对情感异化的表现与机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但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扬弃这种异化，却未能给出有效的、系统的解决方案。很多理论最终走向了文化批判、伦理呼吁，或者提出一些改良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参考价值，但都没有触及数据私人占有这一深层问题，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情感异化问题。只要资本增殖的逻辑仍不受约束地向情感领域渗透，情感异化就会持续存在并不断深化，单纯的伦理呼吁与技术改良无法改变这一根本趋势。二是缺乏对社会结构的深入探索。多数西方批判学者虽然激烈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进行修补与改良，寻求体系内部的优化方案。比如，部分学者提出用数字社会主义解决问题，但这类方案对社会矛盾的认知偏差、对社会变革历史条件的简化、对公共权力重构问题的系统回避，使其容易陷入技术乌托邦和经济改良主义的困境。三是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部分西方批判理论从抽象的人性、抽象的生命体验出发来批判情感异化，将异化归结为技术对人性的压抑与对生命的消耗，而没有将情感异化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生产关系中进行考察，也没有充分结合具体的社会结构分析。这种人本主义的批判视角，虽然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但容易滑向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历史困境的实质是将技术系统从社会系统中抽离而出的本质主义困境，具体表现为技术工具化假定或技术实体化预设忽视了背后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关系。”[14]如果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情感异化的根源，那就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最终只能陷入抽象的人道主义呼吁。

4. 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生成逻辑与本质规定

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是资本逻辑、交往逻辑与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情感领域的全面殖民。

(一) 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从实体商品到情感要素的资本化

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本质是推动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的根本动因。传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增殖活动主要依托物质商品的生产以及交换开展，情感会被资本加以利用并且该类情感仅充当营销辅助手段以及服务附加内容，无法成为独立的增殖要素以及核心剥削载体。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可以实现情感的量化处理与市场化交易，故而情感可以脱离资本增殖的辅助属性转变为核心生产要素以及消费载体，全面的资本化状态就此形成。生产维度下的情感是支撑资本运行的重要生产要素，情感劳动也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全新形式。平台职业主播、专业内容创作者开展的情感表演劳动和普通用户在社交场景中付出的无偿情感投入，都会被资本纳入生产范畴并且转化为流量、注意力以及数据资源，后续可以依托广告、打赏、付费服务等形式完成价值增殖。资本可以持续挖掘全新的情感劳动形式并且拓宽情感劳动的覆盖边界，更多社会个体以及个人生命时间都会被纳入情感生产范畴，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收益就此达成。消费维度下的情感是可供资本利用的核心消费对象。情感陪伴 AI 产品、心理疗愈服务、情感 IP 以及沉浸式体验产品等多元品类，都可以被资本用来搭建全新的情感消费场景，大众具备的情感消费欲望也会被充分激发。消费行为带来的情感满足具备短暂性与浅层性的特征，资本可以持续创造全新的情感刺激点以及情感需求点，往复循环的消费模式就此形成，稳定持续的资本增殖也可以借此实现。

(二) 社会关系的数字化重构：交往虚拟化与情感的去身体化

数字技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人类交往模式以及社会关系完成全方位重塑，社会关系整体呈现数字化、虚拟化以及中介化的发展特征，研究说明该变化可以从存在论层面革新情感生成的社会根基，并

且推动情感出现异化问题。一方面，数字交往的便捷性导致了情感的碎片化与短暂化。在数字化进程中，过度沉溺于“短暂性快感”，容易导致人的自我认知遮蔽、情感联结断裂、自我认同消磨和意义世界解构[15]。数字平台打破时空层面的物理束缚使得大众可以不受场景与时间约束开展情感交流，交往的整体范围以及互动频率得到大幅拓展，交往具备的深度与稳定性却被客观弱化。社会交往本身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而数字平台极大地放大了这种表演性。另一方面，数字交往导致了情感的去身体化。“人与人的关系被编码为数据关系，掩盖了交往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性。”[16]传统面对面的交往场景可以支撑大众依托语言、表情、肢体动作、语气语调等多重感官信息完成情感互通，身体的在场状态使得情感交流具备丰富性、立体性与微妙性，交流过程自带不可替代的温度与质感。数字交往大多依托文字、图片、短视频等符号化媒介完成开展，身体主体隐匿于电子屏幕后方，故而情感交流彻底丧失具身性的核心基础。情感表演成为数字空间主流交往状态的情况下，个体真实表达情感的能力与胆量会逐步流失，虚假的情感表演充斥人际互动的各个场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联结持续弱化，人机共生的良性发展路径无法顺利搭建的原因是大众未能清晰界定数字交往的情感边界[17]。

(三) 深层根源：数据私人占有与情感数据的集中控制

数据私人占有是数字时代资源占有方式的一种延伸。数字平台通过格式条款化的用户协议、技术壁垒与市场垄断地位，无偿收集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行为数据与个人信息，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情感数据与情绪痕迹。这些数据原本是用户情感活动的产物，是用户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其天然的创造者与所有者应当是用户本身。然而在数据私有制下，它们被平台企业所无偿占有，成为平台的私有资产与核心生产资料。平台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算法训练、广告投放与商业变现，获得高额收益，而广大用户却无法分享数据红利，反而要承受数据滥用、情感被干预、隐私被侵等后果。一方面，情感异化的深层制度根源，在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据私有制。“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逻辑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当代表现形式，通过对数据、算法与平台的私有化占有，深度介入并重构了精神生产的运行逻辑与呈现形式，使精神生产日益偏离其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规定。”[18]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些由亿万用户共同创造的情感数据，被少数数字平台企业所垄断占有，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操控社会情感的工具。另一方面，情感数据的垄断占有，使得资本拥有了系统性操控社会情感的权力。数字媒体时代，以媒介为基础的“公众”正在经历从“理性公众”向“情感公众”再到“理性”和“情感”数据化、标签化的“全息公众”转型[19]。因此，数据私有制是情感异化的制度性根源与最终症结，只要数据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就能够通过占有情感数据来实现对情感的操控与剥削，情感异化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5. 数字情感秩序构建的现实路径

数字情感文明的建构需要从技术、文化、主体多个维度协同发力，统筹推进。数字社会情感秩序的建构不能停留于理念层面的原则倡议，需要立足我国现实社会语境，在与西方各类批判理论开展对话的基础上，吸收其合理洞见，同时规避其理论局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数字情感文明建构的实践路径。

(一) 优化技术导向，发展情感友好型数字应用

技术是一种复杂的多重矛盾统一体，技术异化源于技术矛盾及其运动，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与人性基础，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会带来人性扭曲与社会畸形发展的风险[20]。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导致情感异化，也能够服务于情感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价值导向。重要的是要“保持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21]。

首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现实情感交往。数字技术不应该取代现实交往，而应该丰富线下联结。鼓

励开发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工具、家庭互动平台、社区情感互助应用等，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的交往桥梁，让数字技术回归工具属性，而非用虚拟情感替代真实情感。其次，确立技术发展的人文导向。改变效率优先、利润优先的片面导向，在产品设计全过程中融入情感关怀，开发能够促进深度交流、提升情感能力的数字服务。最后，发展向善算法。推动算法伦理落地，改变以停留时间、点击率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引入内容质量、情感健康、用户长期福祉等多元维度，引导算法推荐更具人文温度的内容。

(二) 涵养数字文化，引导理性健康的情感表达

建构数字情感文明，需要从文化层面入手，培育数字人文精神，消解消费主义的情感幻象，构建积极健康的数字情感文化。

一方面，弘扬人文精神，重塑情感的本真价值。当人们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时，它不再是个人的真实性情感的流露[22]。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追求与全面发展。数字时代更需要引导人们认识到，真正的情感价值在于真诚的交流、深度的联结、精神的共鸣与共同的成长，而不是物质消费、流量数字与感官刺激，要引导人们追求有深度、有意义、有温度的情感生活，回归情感的本真意义与人的本质。另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情感智慧，滋养数字情感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积淀，凝练出真挚醇厚、通透博大的情感智慧，其中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赤诚爱国情怀，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真挚处世情怀，更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孝亲温情、“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邻里善意、“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心境。这些传统智慧对于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 提升数字素养，培育自主平衡的情感生活

情感异化的核心表现，是个体情感自主性的丧失，扬弃情感异化，最终要落实到个体层面。

首先，提升数字媒介素养，增强对算法操控的识别与抵御能力。要发挥数字媒介的情感凝聚力与正向引导作用，重点培养人们对数字信息的辨别能力、对算法机制的认知能力与对数字生活的管理能力，引导人们理性、节制地使用数字产品，合理控制使用时间，学会主动筛选信息，有意识地突破信息茧房，保持独立思考与情感自主，不被算法牵着走，不被流量裹挟。其次，确立自主立场，主动抵御情感异化。个体应当自觉跳出“点赞崇拜”“流量焦虑”“人设内卷”的价值陷阱，不再以互动数据、虚拟认同作为评判自我情感与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在日常数字实践中主动开展“情感断联”式自主实践：适度减少短视频、直播等强情绪刺激平台的使用时长，减少标准化情感内容的被动投喂；减少刻意迎合大众、算法的表演化自我呈现，降低为博取关注而进行的虚假情感输出，唯有主动掌控数字使用的边界，才能守住情感自主的阵地。最后，培育情感素养，提升情感感知与表达能力。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开展面对面的深度交往，在真实的互动中锻炼情感感知能力与共情能力，避免因过度依赖数字交往而导致情感能力退化与共情能力下降，要培养丰富的兴趣爱好与高尚的精神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充实的情感体验与精神满足，减少对虚拟情感消费的依赖与渴求。

6. 结论：数字情感文明与人的类本质复归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人通过感性实践、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对象性关系确证自身本质力量，丰富、真诚、具身的情感交往正是人确证类本质的核心实践形式。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据垄断、算法规训、情感商品化，割裂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现实世界的感性联结，掏空人的类本质，使人沦为流量、数据、资本的附属客体，生命情感走向焦土化、空心化，本质上是人的类本质深度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批判流派捕捉到这一时代症候，从多重维度展开深刻剖析，为我们认清数字时代精神困境提供重要理论资源。但受制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理论视野，其批判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深层

结构，扬弃路径多流于表层改良。

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数字情感文明建构，本质上是数字时代一场人的类本质复归实践。其核心要义在于剥离资本逻辑对情感的支配，重建真实、具身、自由自觉的感性交往实践：让情感不再是可供买卖的数据商品，不再是算法调度的情绪素材，不再是博取流量的表演工具，重新回归人与人真诚精神联结的本真形态；让数字技术回归中介工具的本位，不再成为资本收割生命情感的统治装置，转而作为拓展真实交往、普惠精神服务、滋养心灵的载体；让数据资源摆脱少数平台的集中控制，以公共属性服务全体人民的情感福祉。

基金项目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6 年度重点马院建设项目：《数智时代加强高校思政课情感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kustmy202607)。

参考文献

[1] 黄其洪. 论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四个维度[J]. 湖南社会科学, 2026(2): 23-33.

[2] 王丽雅. 情感何以被资本利用——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异化的批判性透视[J]. 哲学动态, 2026(5): 28-46.

[3] 希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

[4] Hochschild, A.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x.

[5] Illouz, E.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5.

[6]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61.

[7] Hardt, M. and Negri, A. (2000)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2.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038325

[8] Terranova, T.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 33-58. https://doi.org/10.1215/01642472-18-2_63-33

[9] 康初莹, 裴梦梵. 短视频情感传播研究脉络与热点的可视化分析[J]. 传播与版权, 2025(6): 74-77.

[10] [美]乔纳森·克拉里. 焦土故事: 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3: 51.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2+501.

[12] 张红, 唐汉卫, 张珈瑜泽, 等. “数字资本”何以影响学生的创造性——基于 SSES2023 的数据分析[J]. 中国电化教育, 2025(5): 53-60, 94.

[13] 张荣军, 李豪坤. 超越“冷亲密”: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与解放[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4(2): 104-114.

[14] 黄晓伟, 张成岗. 技术决定论的现代性透视: 源起、脉络及反思[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 34(11): 27-32.

[15] 谢玉进, 张楷芹. 数智时代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图景与实现进路[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6, 6(1): 90-99.

[16] 贾淑品, 郑晓燕. 数字资本主义的交往异化批判与消解[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7-25.

[17] 马晓倩, 唐爱民. 儒家情理主义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情感转向[J]. 教育科学, 2026, 42(2): 26-32.

[18] 侯衍社, 姜佩彤. 数字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异化及其超越[J]. 理论探讨, 2026(2): 101-108+2.

[19] 韩瑞霞. 理性、情感、数据: 数字媒介“公众”之演化与“行动”转变[J]. 江西社会科学, 2026, 46(2): 165-174.

[20] 王伯鲁. 技术异化及其消解可能性问题新解[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1(1): 76-81.

[21] 宁殿霞, 位涛涛. 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数字劳动解放[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3): 51-61.

[22] 王鹏. 消费社会的情感劳动及其异化[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0(4): 60-64.